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籌辦與建校^{*}

王耀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本文於2010年11月9日投稿，2011年11月通過審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惠賜寶貴的修改意見，並蒙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提供校史檔案資料，謹此申致謝忱。

摘要

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機關，除臺北帝國大學與臺北高等學校之普通教育系統外，另也建構了醫學、農林、商業和工業等學門的技職教育體系，以培植各種職業技術人才。這些實業專門學校，因應殖民地產業結構之變遷以及政治、社會時勢所需，先後分別創設成立，其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為總督府最後創辦之官立專門學校，在擘畫建校方面必然累積了一定程度的經驗，而草創初期建立的學校體制，對日後該校之整體發展尤甚息息相關。本文即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為中心，考察其籌辦設校與創立伊始的歷史過程，藉此究明殖民統治者創建專門學校的實態與模式。經本文探討得知，2年的籌設期間，當局量能授官，首先延攬擁有辦校經驗之今景彥奠定根基，繼之擴編籌備組織，再委以若槻道隆為首的在臺行政官僚接續經營，循序漸進，逐次推動軟硬體各項建置工作。而羅致來自日本國內工業專精之科長教授，並結合嫺熟臺灣現況之在臺教育家以及書記幕僚，構築了堅強的師資人事陣容，同時將他們的理想抱負落實於校務制度，從而樹立學校重要的教育目標。另外，在籌校前階段，計畫一度瀕臨幾乎胎死腹中之變局，其主因乃係受到日本國內政黨政治連動影響，政黨內閣將殖民統治私有化導致教育政策呈現斷裂與混亂，此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設校籌建經緯，亦可洞悉真貌。

關鍵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籌備建校、今景彥、若槻道隆、教育目標

壹、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專門學校，創校迄今將屆百年，不論戰前戰後，莫問日臺族群，已培育無數各行各業傑出的菁英俊彥，為臺灣的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刻畫永難磨滅的貢獻。當年每一所學校之成立，均有其時空背景因素，殖民當局亦基於統治和開發本島需要，將設校構想付諸政策實行，並經歷周詳而縝密之籌辦過程，逐步建構完整的實業專門教育體系。

汪知亭在論述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機關，曾指出日本人於開校之先，皆經過一段時間周密籌備，¹然而有關籌畫過程及其業務推動的實際情形如何，一般常被忽略，至今也少有專論加以分析探討。事實上，籌備建校階段尤甚關係日後學校之成立和發展，在妥善規劃與充裕預算的保障下，次第興修硬體設備，樹立健全之法規制度以及人事組織，奠定其永續經營的重要基礎。特別是籌辦人員和草創初期之教職員，他們所懷抱的理想願景直接反映在學校教育目標，也深深影響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

創建於1931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²即為今日國立成功大學之前身，也是臺灣總督府最後創辦之官立高等專門教育機構。在1943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置工學部（工學院）以前，可說是全臺工業教育的最高學府，且是唯一工科高等教育機關，縱使現今，該校在南臺灣仍扮演著教育龍頭的角色地位。關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的校史研究，如今已見

1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156。

2 日治時期創校正式名稱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雖然1944年3月31日依敕令第250號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變更校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然而此日治末期的校名未及2年旋即由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而結束，歷史較為短暫，故本文仍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代表日治時期的該校，同時將府立之「臺灣總督府」略除。另外，戰前一般雖以「臺南高工」簡稱，惟與現今通稱的「臺南高工」（創建於1941年4月，屬中等教育階段之甲種實業學校，原名「臺南州立臺南工業學校」，今為「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易生混淆，因此除原文引用外，本文不使用「臺南高工」之校名簡稱。至於作為學制上的「高等工業學校」用詞，為免行文篇幅冗長，有時則以「高工」略稱，特此說明。

一些成果，³惟針對籌備設校方面之考察，申論著墨較少，難免有美中不足之憾。是故，本文擬就該校籌建過程為中心，藉由文獻檔案史料、報紙刊物和時人回顧紀錄等，深入探討學校從無到有複雜的創設歷程，同時剖析殖民統治者興學辦校的宗旨與目標，以闡明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立的具體樣貌，企盼有助於理解總督府之創校模式。

在進入本文討論之前，首先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專門學校的歷史演變，以及本校設立決策過程，作簡要之背景說明。⁴殖民體制下的臺灣教育，從領臺初期紛亂的無方針主義，直至1919年頒訂的「臺灣教育令」，始具體架構以臺灣人為對象的全面性教育制度，也開啟了臺灣人接受有系統專門教育之途徑。依循該法令種族隔離為原則的雙軌制，公學校畢業之臺籍學生就讀由總督府醫學校改制而成的醫學專門學校，以及新設的農林、商業專門學校等三校；而在臺日人則按日本國內的專門學校令，中學校畢業後升學進入醫學專門學校附設之醫學專門部和新成立的高等商業學校等二校，上述學校中除商業專門學校（簡稱商專）位於臺南外，其餘各校均設在臺北。

1922年田健治郎總督時代，配合「內地延長主義」，貫徹日臺融合的同化教育理念，修正公布臺灣教育令（新臺灣教育令）。專門教育在與日本國內法制整合且實施日臺共學制的單軌體系下，升格改制原先臺灣人就讀學校之層級位階和日本相同，並整編發展成為醫學專門學校、高等農林學校及原有的高等商業學校。至於前期專收臺籍學生的臺南商專，為適用日本國內學制，且同質性的商業類專門學校二所無並存之需，當局遂決定俟末屆學生畢業後予以廢校。

伴隨著南臺灣唯一最高學府商專的裁撤，引起南部民眾，尤其臺

3 如：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高淑媛，〈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和臺灣工業化〉，該2篇論文均收錄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輯，《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2年）。另外，王榮，〈日本統治時代の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に關する一考察〉，《現代臺灣研究》，第23號（2002年7月），頁57-71；陳順清，〈1927-1956之臺灣工業教育：以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與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2期（2009年6月），頁23-62；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立之研究〉，《臺灣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6月），頁53-95等。

4 以下整理自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立之研究〉，頁53-95。

人的憂慮與不安，於是以臺南為中心展開商專升格高商之請願運動。當時官方曾有提議設立高工以替代廢校後的商專，然只停留於紙上談兵階段，終究未見實現。嗣後，經內田嘉吉總督更迭，後任的伊澤多喜男總督時代，要求新設高商之日臺市民聯合運動再起，總督府一方面承受民間運動壓力；另一方面也體認需在南臺灣成立專門學校的實際必要，雖然日本中央政府出現反對意見而幾經波折，但最後仍如願於1926年9月設立臺南高等商業學校（臺南高商），而原先1919年臺北創建之高商則改稱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北高商）。

此時期正值日本國內政黨政治日漸成形，憲政會（日後之立憲民政黨）與政友會之政黨內閣輪替，也影響殖民地的人事佈局和治臺政策。隸屬偏政友會系統之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之後，繼任的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則為憲政會系。上山總督在職的1927年10月召開兩次總督府評議會，當時提出設置高等工業學校之建議，此項構想後由接任之總督、同屬田中義一內閣立憲政友會的川村竹治，於1928年7月正式付諸政策推行。

在設校決策過程中，當局基於本島二所高商過多之理由，加上財政經費因素，乃決定將創校不久的臺南高商予以廢止，以交換條件方式，在同一地點的臺南市另設高等工業學校。總督府的此舉措施，招致臺南高商學生及家長等關係者的不滿與抗爭，臺人有識者更以臺南高商傳承臺人本位學校商專校史精神之象徵意義，強烈抨擊當局無理的廢校政策。惟面對既定方針大勢所趨，加諸大部分臺南市民接受專校廢立調整的交換條件，反對臺南高商廢校運動遂終歸沈寂。相對地，新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相關預算，則於翌年1929年2、3月順利通過日本國會審議，4月起開始進入籌備設校階段。⁵

綜觀上述專門學校制度的歷史演變可知，自臺灣教育令實施以降，

5 〈石黑局長上京〉，《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11日，2版；〈文教局長上京用務〉，《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12日，夕刊1版；〈臺南高工開設準備，石黑局長上京奔走中〉，《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23日，夕刊1版。石黑英彥文教局長利用返國機會，一方面協助法制局制訂臺南高商廢止官制；另一方面著手準備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籌設事宜，除物色日後擔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長之籌備委員長人選外，並預定仿效當年臺北帝大先例，於1931年開校前派遣教授出國研修。

在臺南地區出現商專、高商、高工相繼興廢之歷程，其教育政策的混亂與缺乏連貫性，不僅牽涉因日本國內政黨政治連動影響下總督更替頻仍之變局，也隱含著在地社群或族群間錯綜複雜的民情動向。

另外，有關日本帝國議會審議通過之高工預算，根據校方檔案記載，內容概括如下：⁶

- 一、創設準備費29,188圓：含從事籌備業務之「屬」1人、「囑託」1人的薪俸和事務費14,818圓，以及日後擔任科長3人派遣赴海外研究的經費14,370圓。
- 二、新校舍營建費1,123,834圓：原編列自1929年度起連續為期4年之預算，因國庫財政困難，遂延長一年成為5年期的繼續事業。至於購買校地費用，所需土地5萬3千坪由臺南州寄贈，故無編列。
- 三、學科選定與教職員編制：針對前者，有鑑於臺灣實情，暫定為形成各種工業基礎的機械工學、電氣工學，以及適應製造工業需要之應用化學等三科，其他必要學科則待將來再增設。關於後者，至完成年度所需定額為校長1人、教授20人、助教授9人、助手3人、書記6人，其經常費概算296,972圓。⁷

以下主要就1929年4月起著手準備設校事宜，經1931年1月7日勅令第2號頒布、15日施行之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正式創校成立，⁸迄至同年4月首屆新生入學為止，考察其籌辦工作推動進展之情形。

貳、籌備組織及其活動

6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為戰前校方留下之手稿本檔案，以下簡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1-2。

7 有關學科設置、至完成年度教職員編制規劃及其預算概算等，亦可參見〈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ヲ改正ス〉，《公文類聚》第55編・昭和6年・第九卷・官職七・官制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1200619500・類01735100）內說明與「附屬書類」。

8 《臺灣總督府府報》（以下簡稱《府報》）昭和1148號，1931年1月13日，頁51；《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4；〈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の件公布〉，《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8日，2版。

1929年4月1日，總督府延聘今景彥擔任創設事務之囑託。⁹今景彥生於1870年，出身東京府士族，秋田縣尋常師範學校畢業後，執小學教鞭數年。1893年被薦舉為特別生入學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機械科，畢業後歷任各種實業工業學校教員、校長，曾參與東京府立工藝學校成立籌畫工作，且屢受政府單位委託，出任特約審查官或委員。1911年奉命調任南滿洲工業學校校長，1922年兼職南滿洲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期間亦曾擔任大連市立商工學校創立事務囑託，之後並就任校長，直至1925年9月始依願免官在滿洲所有職務。¹⁰今氏教育資歷完整，尤其熟稔工業教育體系，又負責多所學校籌設事務，經驗豐富，且曾出訪歐美，頗富國際視野，能獲當局沿才授職，可謂實至名歸。另外，今景彥在過去滿洲任職期間，與時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社長川村竹治本為舊識，這層關係加上個人優異條件，恰如其分之人事安排，一般認為創立委員長的今氏，必是日後接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長的不二人選。¹¹

今景彥於1929年4月下旬抵臺赴任，籌備業務次第就緒妥當，輿論對於臺南從此得以確立工業都市目標，寄予高度厚望。¹²由當時的媒體報導可知，今氏來臺後立刻親臨臺南勘查選定校地，並與文教局磋商下年度預算以及至開校期間所有籌畫事宜，隨後旋即於5月9日離臺返日，為物色適任之科長，在東京暫行事務。今景彥強調三科長的選任甚為緊要，擬從工業博士中拔擢新進人才，一旦科長既定，各學科師資陣容則委由科長全權負責；同時也將派遣赴海外研修，不僅歐美，依據本校創立旨趣，亦考慮派至重要活動舞臺之南洋地方，進行實地調查研究。¹³

事實上，為尋覓適當科長人選，令今氏煞費苦心，在透過日本國內

9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2；〈今景彥（囑託；月手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4年（1929年）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冊號10221，文號6。當時今景彥位階正七位。

10 參考同上註《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內今景彥之履歷書；〈創立臺南高等工業，委員長決定今氏〉，《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6日，夕刊4版。

11 〈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9日，夕刊1版。補充說明：川村竹治於1922年10月24日至1924年6月22日，任職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社長。

12 〈その日、その日〉，《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23日，夕刊1版。

13 〈臺南高工には電氣、機械、應用化學を置き，各科30名生徒は6年度から募集，創立委員長今景彥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9日，夕刊2版。

工業界前輩大老的贊襄之下，以分科分擔協尋推薦方式徵引賢才。¹⁴如後述所言，最終三科長人事遲至1929年12月及1930年4月間方才相繼確定，由此可見，籌備活動的起始初年，今景彥投注相當多的時間與心思在此；相對地，也顯示日本國內對這所新設高工抱持重視而審慎的態度。

1930年1月8日，籌設組織擴編為委員會形式，任命文教局長杉本良、營繕課長技師井手薰、學務課長視學官若槻道隆、中央研究所技師加福均三、學務課事務官江藤昌之、學務課視學官森谷一、囑託今景彥等7人為創設委員，¹⁵繼之於同年5月21日再追加負責專門教育之總督府視學官山口重知，¹⁶成為8人體制。該委員會除原本之今景彥外，從其餘7人的職位屬性觀之，略可窺知業務重心逐漸擴大轉移至教育行政官僚、工業技師，以及為校地校舍整建而加入的營建技術官僚手中。委員會成立後隨即召開會議，¹⁷面對最後一年的籌辦期限，積極推展建校工作，舉凡校園興修、科長聘任與海外研修，乃至於招生相關事務等，日趨步上正軌。¹⁸

其中值得注目的是，若槻道隆在此階段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也是日後若槻順理成章接掌首任校長的主因之一。譬如1930年7月，若槻南下視察工程並對外發表談話，講解校舍興建規劃進度 and 科長動向之外，進一步提到將著手擬定制服、制帽樣式等；¹⁹又如同年11月14日，若槻奉命返國上京，前往拓務省、法制局說明學校官制事宜。²⁰此外，

14 〈臺南高工の三科長，本月中に人選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0月11日，2版。

15 《府報》昭和第857號，1930年1月9日，頁15；《府報》昭和第858號，1930年1月10日，頁21；《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2-3；〈臺南高工の創立委員，八日付任命〉，《臺南新報》，1930年1月9日，2版。

16 〈山口重知高等工業學校創設委員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0，文號79；《府報》昭和第966號，1930年5月23日，頁91。關於追加山口重知委員一事，並未記載於校史檔案，為何如此，未可詳知。

17 〈高工創立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月14日，2版。

18 參見〈臺南高工來年四月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13日，2版；〈四月開校の臺南高等工業，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2月27日，2版。

19 〈愈々來年度から開く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若槻學務課長の談〉，《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7月23日，夕刊2版。

20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府報》昭和第1096號，1930年11月5日，頁6；《府報》昭和第1109號，1930年11月19日，頁65。

時任臺北一中教員、日後轉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英語科教授兼生徒主事的伊形德一，在其回憶錄中描述1930年歲暮接受若槻面邀決定南下任教，並於翌年初利用下午半天班至文教局學務課協助開校準備工作，與若槻也深入討論制服、制帽、領帶等問題，伊形就指出當時學務課長的若槻已內定出任校長。²¹由上述種種事例得知，第二年的籌備期間若槻在委員會深具代表性，無論發言權、人事權或業務內容規劃等，顯然若槻位居重要主導地位。

綜上論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2年的籌辦過程概可分為兩階段，前階段的1929年以今景彥為核心，主要任務為決定校地位址和物色科長人選；而後階段之1930年則以若槻道隆為首的行政官僚班底，工作重點亦擴充涵蓋校地校舍建築、充實師資、訂定官制學則法規、策劃招生業務等具體層面，甚至細微如制服制帽樣式採用之瑣碎事項。然而，原本被認為接任校長呼聲最高的今景彥，為何後來改換成若槻，試比較兩人資歷經驗，或許可一探究源。

若槻道隆1883年生，長野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哲學科畢業，擔任中學校教員後歷任日本桐生、米澤兩所高工教授，並就任長野中學校校長，1925年調派來臺任職總督府視學官、學務課長。1930年底，杉本文教局長以適任之由呈報若槻校長人事案，²²隔年1月13日通過內閣會議任命，當時臺灣輿論也表示若槻掌理學校官制及創立準備事務迄今，實為當然人選，²³明顯反映前述若槻在後階段所扮演的關鍵性格。

基本上，若槻與今景彥2人教育資歷相當，於日本國內抑或所屬外地均有中等學校、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擔任教職或校長之經驗，且曾赴歐美考察。雖然若槻非工業科班出身，但桐生、米澤兩所高工教授經

21 伊形德一，《碌々四十年》（東京：東宣出版，1979年），頁49-52；伊形德一，〈若槻校長の片鱗を覗く〉，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東京：開校5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81年），頁68-69。

22 詳見〈若槻道隆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長、俸給〉及若槻履歷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3，文號5。當時若槻位階正五位勳五等。

23 〈臺南高工校長に若槻視學官任命、教職員の任命と共に急速に開校準備〉，《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4日，2版；〈高工校長任命若槻氏，陞高等官二等〉，《臺灣日日新報》，同日4版；〈臺南高工職員既任命，急速籌備開校，三科教授不日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5日，8版。

歷，²⁴加上年富力強，春秋鼎盛，而高等官三等、官銜正五位勳五等優於今氏之委任囑託判任官的正七位，更重要的是，若槻長年參與臺灣教育行政，熟悉殖民地臺灣教育情況，並主導統籌後階段創校業務，出任校長堪稱名實相副。就整體而言，借重今景彥豐富的籌校經驗奠定根基，再倚托年輕且嫻熟臺灣教育行政的若槻接續經營，前後分司其職，各展長才，顯示當局在擘畫建校的用人方面慎重之態度。伴隨著1931年1月15日學校官制公布實施，若槻校長正式上任，今景彥也完成階段性任務而解除囑託職務，²⁵初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開始迎接另一嶄新的面貌。

至於原預算編列中「屬」一職部分，1929年11月6日勅令第320號頒布施行總督府部內臨時職員設置制中改正，增設從事高等工業學校創設準備事務之專任屬1人，²⁶總督府援此法源，於1930年1月30日任命臺南師範學校書記金成茂生兼職該屬，並調派至文教局勤務。²⁷繼之，1930年8月26日復依勅令第166號修正為2人，²⁸而此臨時職員編制亦隨著1931年1月15日學校成立，以勅令第1號刪除法條，²⁹結束其任務編組的使命。

參、中挫與再興

實際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2年的籌辦過程並非全然順利，日本國內的政黨輪替波及臺灣總督人事更迭，也影響政策走向，致使籌建中的新設高工一度遭受頓挫。1929年7月，立憲民政黨浜口雄幸取代立憲政

24 林孟欣指出兩所高工教授之經歷，可能是若槻脫穎而出接掌校長的關鍵，惟依本文研究，事實上並不純然如此。參見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頁236。

25 〈今景彥（解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冊號10228，文號6。

26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2；《府報》昭和816號，1929年11月12日，頁31。

27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府報》昭和877號，1930年1月31日，頁100。另外，在此之前的1月8日發布7人創設委員的同時，也任命總督府屬黑住俊昭、毛利寬2人隨附委員協助，見《府報》昭和857號，1930年1月9日，頁15。

28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府報》昭和1047號，1930年9月2日，頁3-4。

29 《府報》昭和1148號，1931年1月13日，頁51。

友會的田中義一組閣，臺灣總督府亦由川村竹治、河原田稼吉體制，改換為同屬民政黨系的石塚英藏總督和人見次郎總務長官。³⁰新內閣採取緊縮政策，導致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新建校舍等新規事業預算被削減，臺南民眾驚愕之餘，各實業團體緊急講究對策，並擬召開市民大會，期望預算得以敗部復活。³¹

根據當時媒體報導，臺南有志者聯袂北上陳情，當局也竭力謀求應變之道，試圖挽回頹勢。蓋臺南市已耗費鉅資購地整理，且近日將辦理寄贈國庫手續，而今景彥現正在日本國內物色科長人選略見頭緒，學校設計圖案亦業已完成送呈，倘若計畫因此中止，則與臺南高商同歸絕望，誠令人欲哭無淚。文教局強調，創設高工之政策案無關政黨派系，乃是上山前總督時代以來的宿案，可視為既定事業，接任之川村總督贊同並延續此計畫，因礙於經費關係無法兩立，於是廢止臺南高商改設高工，且自本年度起作為繼續事業積極推動。³²

如是觀之，針對新設高工問題主要的癥結點在於雙方認知見解的差異，簡言之，中央政府新內閣認定為新規事業，在迫於財政緊縮下，遂成為預算刪除的對象；而總督府則主張係屬前朝廷續下來的既定事業，也是通過國會預算審議之連續事業，宜超越黨派框架思維，不應淪為政爭議題。依當時返國努力交涉的總督府財務局評估，本年度被削除額1,400萬圓中，確信可望復活者約500萬圓，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新營費13萬5千圓亦列名其中。³³

固然高工預算漸有復活希望，惟面對未可逆料之變局，臺南有志者一方面欲待新總督人事更迭後發起請願運動；另一方面央請人正在東京

30 黃昭堂，《臺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8年），頁126。

31 〈臺南の市民を脅かす政府の緊縮策，高工其他の復活要求の聲を挙げんとする市民〉，《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18日，5版；〈高工復活安平築港，臺南市民將開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19日，夕刊4版。

32 〈復活要望の走り，臺南『高工』を提ぐ，政黨政派に超越した大問題として，當局と力を併せ實現を期す〉，《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19日，7版；〈臺南高工復活要望，問題與政黨無關，官民併力務期實現〉，《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20日，夕刊4版。附帶說明：此時的臺灣總督府重要主管人事尚未替換，新總督石塚英藏於7月30日、人見次郎總務長官於8月3日、杉本良文教局長則於8月10日才分別上任，故當時面對實行預算問題，仍是舊朝的川村竹治、河原田稼吉和石黑英彥。

33 〈總督府新規事業，削除額千四百萬圓中，有復活確信者五百萬圓，嘉南大圳工事可照豫定完成，電力出資其他四項幾乎無望〉，《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20日，夕刊4版。

的臺南實業協和會會長、於臺南經營愛生堂之地方聞人高島鈴三郎奔走請命，進而擬議籌開市民大會，訴諸公論。³⁴誠然，臺南商專、臺南高商先後廢校，如今眼見已確立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若再無法實現，兩俱皆空的結果，對臺南民眾而言，情何以堪。然而，相較於熱烈展開請願運動的在地有力人士，臺人有識者則指出這些以新舊州市協議會員為主體、自稱市民代表的紳商，絕大都是之前「信臺南高商若廢止，定要設置高等工業學校以應奢望，而坐視高商倒閉者」，故一般民眾對此運動甚表冷淡，更對該等市民代表的誠意頗感疑慮。³⁵顯而易見，民間輿情摻雜著昔日臺南高商存廢問題，日臺族群抗爭意識之餘韻，猶然留存至今。

推測或許受到上級關切壓力，也可能情勢出現轉圜跡象，市民大會相關活動驟然決定暫停，僅於7月29日向浜口首相、松田源治拓相和其他重要關係者呈遞陳情電報。³⁶時序進入8月，陷入混沌未明狀態的高工問題終於露出曙光，在督府當局極力爭取下，大藏省原則上同意其年度預算執行，³⁷而地方有志者亦於8月18日集會商討今後方針後，休止月餘以來的請願行動。³⁸

由上述事件之考察分析可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籌設的前階段，適逢日本國內政局變動，建校準備工作歷經幾乎胎死腹中又再起死回生之驚險過程，另外也發現總督府積極介入、企圖挽回的態度，以及相異立場觀點所呈現的在地複雜民情動向。此後至1931年學校成立期間，日本國內在立憲民政黨浜口內閣繼續執政下，政局相對穩定發展，縱使中央政府延續其節約緊縮政策，且因霧社事件臺灣總督改由仍屬民政黨系

3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如下報導：〈高等工業新營豫算復活のため，臺南市民いきり立つ〉，1929年7月24日，5版；〈臺南高工新營豫算復活，市民將躍起運動〉，1929年7月25日，夕刊4版；〈臺南高工問題で市民大會計畫，三十日その打合會開催〉，1929年7月28日，5版；〈臺南高工問題，市民大會〉，1929年7月29日，8版。

35 〈臺南一部紳商の高工復活運動，市民們多甚冷淡〉，《臺灣民報》，1929年8月4日，第272號，4版。

36 〈臺南高工問題，市民大會は中止〉，《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30日，5版。

37 〈臺南高工の復活は有望，商工館、新港築港は脈なし，督府實行預算の雲行〉，《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4日，2版；〈豫算復活與日月潭〉，《臺灣民報》，1929年8月11日，第273號，2版。

38 〈臺南高工對策打合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19日，5版。

的太田政弘接任，高工預算大致未再遭受重大變故與杯葛。尤其事關開校緊要時刻之1931年度，總督府特增列開始授課所需經費23萬餘圓，人見總務長官對此亦欣慰表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創設，本島專門教育機關大體上架構完成。³⁹

肆、硬體建設

一、校地

有關校地擇址，臺南地方政府初步規劃三處候補預定地，恰巧位於臺南市北、東、南三區，而原先內定沿用前臺南高商預定校地，亦即位處北區舊山砲部隊駐在地的鄭子寮，因考慮位置與面積，有意摒除在外，但最終結果仍須靜待今景彥及總督府派員南下勘查方能決定。臺南州當局一方面召開臨時協議會，通過購地整地年度追加預算；另一方面規劃所需土地近5萬3千坪，其中除十分之一左右為官有地外，其餘民有地按時價進行徵收；同時，唯恐有心人士趁機哄抬並炒作地價，對於預定地一切事宜嚴守秘而不宣之態度。⁴⁰

1929年4月26日，河原田總務長官協同石黑英彥文教局長、今景彥以及井手薰營繕技師親臨臺南實地視察，最後擇定以市東郊民有地作為新校用地。⁴¹依當時說法，該三處預定地互見長短，各有利弊，原訂北區鄭子寮之舊山砲部隊駐地，因接近市區，已缺乏擴張空間；南區的

39 〈新規事業，其の他とその金額〉；〈特殊事情を諒察，新規事業多し，豫算編成につき，人見長官談〉，兩則報導均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2月27日，夕刊1版。另外，有關1931年度通過國會預算審議之高工新營費，參見《府報》昭和第1217號，1931年4月10日，頁57。

40 〈新設の臺南高工，敷地は〉，《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12日，5版；〈極密裡に選定中の臺灣高工豫定地，要地五萬二千坪に及び，略内定してゐ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21日，5版。

41 參見以下《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南高工の敷地，最後の決定を為すべく，河原田長官一行臺南へ〉，1929年4月24日，7版；〈臺南高工校敷地，為最後之決定，河原田長官一行向臺南〉，1929年4月25日，夕刊4版；〈總務長官一行臺南著〉，1929年4月27日，夕刊1版；〈河原田長官一行檢查商工（按：應為「高工」之誤）校地，自南歸府〉，1929年4月28日，夕刊4版。此外，《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2。

桶盤棧町一帶丘陵地，則計畫將來劃歸為大臺南市新市街；而位在舊東門城廓外、緊鄰第二中學校和步兵第二聯隊東側之確定校址，雖然交通不便，惟地勢高燥，眺望甚佳，舉目所盡，廣為大平原，故獲得上級青睞，於是拍板定案，雀屏中選。⁴²

州協議會通過之7萬餘圓購地追加預算，於5月經總督府認可後，臺南地方政府隨即展開民有地收購作業。⁴³就行政步驟而言，州政府完成購地並辦妥所有權讓渡轉移登記之後，由州知事具名向總督府提報國庫寄贈手續，同時進行整地基礎工事，再著手興建校舍工程。在購地交涉方面，初期尚稱順利，且平均價格皆在預定金額範圍之內，然而中途也遭遇若干困難。首先，有部分地主對徵收地價表示不滿而延遲簽約；其次，前述7月的年度預算中挫，導致計畫暫時擱置；再則，縱然8月預算復活而重啟籌校業務，但仍有部分產權屬日本內地居住者和開元寺廟產，需取得處分上之認可，因此造成購地程序一再延宕，也影響後續捐贈國庫、整地與建築校舍等作業時程。⁴⁴

翌年1930年1月8日，總督官房會計課公告校地整地招標工程，⁴⁵依約工期應於3月底完成，卻拖延至4月才竣工完畢，正式進入首棟校舍興工階段，⁴⁶至於寄贈國庫手續則於1月30日始辦理完成。⁴⁷從當時的公文檔案可知，此時臺南州捐贈之土地，含原國有地1筆共計16筆，分散於後甲、三分子以及旭町等地（今臺南市東區一帶），合計

42 〈臺南高工敷地，東門町有望，近日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29日，8版。此處所謂「第二中學校」係指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戰後成為現今之臺南一中。

43 〈近く買収に著手する臺南高工建設敷地，面積五萬二千坪，豫算七萬二千餘圓〉，《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12日，夕刊1版；〈最近著手買収之臺南高工建設敷地，面積五萬坪，豫算七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12日，4版。

44 以上整理自《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南高工敷地買収，豫定通り略進捗〉，1929年6月13日，5版；〈臺南高工敷地買収，略已告畢〉，1929年6月14日，夕刊4版；〈高工敷地買収俱畢〉，1929年6月19日，夕刊4版；〈臺南高工の敷地買収成る，雨期明け後工事に著手〉，1929年6月26日，5版；〈臺南高工敷地の買収成る〉，1929年8月16日，夕刊1版；〈臺南高工學校，買収敷地〉，1929年8月16日，4版；〈臺南高工敷地買収進捗〉，1929年10月1日，5版；〈臺南高工敷地基礎籌成〉，1929年10月17日，4版。

45 《府報》昭和第856號，1930年1月8日，頁10；《府報》昭和第857號，1930年1月9日，頁15。

46 〈いよいよ工事にかかる臺南高工の建築，敷地五萬八千坪の地均しは近く完了〉，《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4月18日，夕刊2版。

47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

17.6587甲，⁴⁸換算約51,810.63坪，對照嗣後校史紀錄之實際校地坪數54,969.37略有出入。⁴⁹事實上，在臺南州政府寄贈16筆土地後，至開校期間尚有三期共9筆土地陸續重劃納歸校地。

第一期為1930年5月，臺南州追加捐贈2筆旭町土地共0.1039甲。⁵⁰第二期為1930年7月，文教局照會會計課，請臺南州將三分子2筆官租地計0.0961甲解除租約並編列為校地，當時承租者是高島鈴三郎和謝氏，公文中會計課長特別諭示因屬中途解約，故宜考量承租者避免蒙受權益損失，此案後經州方處理以及簽請總督發布官有地使用認可指令，作業延誤至開校後之1931年3月始定案。⁵¹而第三期則為1930年9月，同樣文教局照會會計課，請臺南州將用地內有礙學校建設發展之現存廢道路與廢溝變更為校地，經州方調查並處理散落於後甲、三分子和旭町5處該類土地共0.856甲，再依總督認可指令，於1931年2月完成行政程序。⁵²

由上可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地的建置與擴增，在州府雙方協合作下，持續進行至正式創校後的1931年3月方才確定，而共計25筆官有地籍管理者名義，亦配合會計年度，儘速於3月由校長若槻道隆接替領收繼承。⁵³

二、校舍

受到預算中挫以及購地整地作業之遲滯，1929年度興建校舍工程

48 〈土地引繼ノ件（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4年（1929年）官有財產書類編，冊號11276，文號70。另外，亦可參見總督官房會計課長請求臺南州知事呈報土地臺帳謄本，〈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土地臺帳謄本（16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官有財產書類編，冊號11277，文號15。

49 校史紀錄參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昭和七年度》（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32年10月），頁94。此外，亦可參照學校完成年度1934年3月井手薰之工事報告，載於《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1934年7月），頁19。

50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敷地引繼ノ件（二筆臺南州ヨリ）〉，《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官有財產書類編，冊號11277，文號22。有關總督官房會計課長請求臺南州知事呈報土地臺帳謄本，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土地臺帳謄本（二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官有財產書類編，冊號11277，文號24。

51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用地引繼受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官有財產書類編，冊號11277，文號98。

52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用地保管轉換ノ件（臺南州ヨリ）〉，《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官有財產書類編，冊號11277，文號94。

53 〈官有地保管轉換ノ件（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官有財產書類編，冊號11277，文號103。

原訂12月開工，⁵⁴延緩至1930年4月始公開招標首棟建築物「理化學實驗室」的承包工程。在此之前，創設事務囑託今景彥曾提示校園規劃重點，略謂：有鑑於臺南沙塵較大，建築方面尤需特別注意，植樹部分亦應按防風、防塵、防沙三階段來考量。⁵⁵另外，總督府也相繼派工程監督員、測量員南下探勘，開始籌畫共計約3萬坪的校舍預定地，⁵⁶並興建監督員臨時事務所，⁵⁷顯見在整地作業的同時，逐步設計描繪校區建築空間格局。

1930年4月12日，總督府公告理化學實驗室招標工程，⁵⁸4月23日契約成立，承包商為臺南市的高橋順三郎，6月上旬鳩工，規定簽約日起5個月的工期，延至10月12日才竣工完成，⁵⁹而本棟成為開校前唯一興建完工的校舍主體建築。⁶⁰之後，為因應首批新生入學，著手規劃圖書室及餐廳等第二期工程，⁶¹1931年4月23日公開招標，5月4日由臺北市的安武安兵衛得標承攬，隨即進駐校內準備興工，⁶²校園漸次呈現整體學府面貌。

綜上所述，2年的籌備期間，在硬體建設方面，1929年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總督府決定校址位置，再由臺南州政府進行購地徵收與寄贈國庫手續，1930年則著重以整地為先，繼之興建理化學實驗室的順序方

54 〈臺南高工の建築著手は十二月中旬から〉，《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1月4日，5版；〈臺南高工校建築期，豫定十二月中旬〉，《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1月5日，夕刊4版。

55 〈臺南高工の創立事務進捗，三工學科長も近く決定，建築方面に特に留意〉，《臺南新報》，1930年1月8日，夕刊1版；〈臺南高工創立事務進捗，三工學科長亦將決定，特留意建築方面〉，《臺南新報》，1930年1月9日，夕刊4版。

56 〈臺南高工新築工事，入札は三月〉，《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2月2日，夕刊2版；〈臺南高工著手新築〉，《臺灣日日新報》，同日夕刊4版。

57 監督員臨時事務所於1930年2月22日竣工，參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新營工事監督員詰所新築外一廉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假建物異動書類，冊號11327，文號4。

58 《府報》昭和第932號，1930年4月12日，頁49。

59 〈臺南高工校舍建築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5月11日，4版；《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5。

60 其他尚有臨時性建築物如守衛室，可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新營工事守衛詰所新設工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5年（1930年）假建物異動書類，冊號11327，文號10。另外，有關全校各棟主體建築完工年度及其面積、建材結構等詳細資料，可參照《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昭和十五年度》（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40年7月），頁147 - 151。

61 〈臺南高工三月上旬著手第二期工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27日，8版。

62 《府報》昭和第1228號，1931年4月24日，頁123；《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7。

針，同時配合行政程序，追加並擴增校地範圍。

關於草創時期的校園景象概況，透過當年師生的記憶印象，略可窺知一斑。例如前述由臺北一中轉任本校之伊形德一即回憶，1931年3月初到學校時，眼前所見廣大的校園，僅只1棟約400坪左右的理化學實驗室，廁所設備付之闕如，與其說是學校，無寧說宛如身處荒涼之廢墟。⁶³另外，入學首屆電氣工學科的伊東貞昭亦描述，寬闊校地獨見1棟校舍，周遭空曠無際，充滿廣漠荒蕪之感；⁶⁴又，就讀同屆應用化學科的小倉勇也追憶，諾大校庭荒野一片，建築物點綴湮沒在雜草叢生中，屢與蛇群相遇乃司空見慣，對於當時科長佐久間巖教授之防蛇配備和能耐，甚表嘆服。⁶⁵

伍、軟體規劃

一、人事體制

延聘優良師資並建立完善的教職員人事體制，無庸諱言，關係學校整體的發展與方向。在籌備前階段被今景彥喻為迫切急務之三科長人選，自1929年底起先後陸續確定。首先，內定接任機械工學科長的藤田保太郎於12月23日奉命暫調至臺北高商擔任教授，藤田旋即於12月29日赴臺就任，翌年初並前往屏東糖廠、嘉義、臺中等地和阿里山視察兼旅行，是三科長中在未赴海外研修前唯一有來臺的經驗者。1930年1月10日任總督府在外研究員，預計以10個月時間至德英美三國進修，2

63 伊形德一，〈75歳の弁〉，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鳳木會會報：第7號》（東京：該會，1977年6月），頁2；伊形德一，〈追懷〉，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鳳木會會報：第23號》（橫浜：該會，1984年5月），頁2；伊形德一，〈碌々四十年〉，頁54。另外，同樣的描述亦見於〈開校祝賀式の擧げらる々まで〉，推測作者應為伊形，收於《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頁2-3。

64 伊東貞昭，〈亡き師の面影を偲んで〉，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75。

65 小倉勇，〈佐久間先生を介して開校當時を偲ぶ〉，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83。

月14日由日本敦賀啟航，隔年1月3日歸國述職。⁶⁶

藤田保太郎1895年生，長野縣人，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学機械工學科畢業，曾任職淺野造船所及東京鋼材株式會社。在1930年末總督府呈報之任命案，註明配合1931年1月15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官制實施，發布其教授人事令，擔任科目為工作法、蒸氣機關。⁶⁷

其次，內定電氣工學科長的長濱重麿於1930年2月10日派任為臺北高商教授，同月28日任總督府在外研究員，4月12日自敦賀出發，經由俄國前往德英美三國研修9個月，1931年1月3日返回日本。⁶⁸

長濱重麿1885年出生於福岡縣，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学電氣工學科畢業後服務於東京砲兵工廠，1911年調任旅順工科學堂（1922年升格為旅順工科大学）教授，任職期間曾留學歐美並獲美國哈佛大學碩士，1922年8月依願免官，回國轉任東邦電力株式會社技師、課長。其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人事任用令如同前述的藤田保太郎，而教授課程為電氣磁氣學、電氣磁氣測定法。⁶⁹

最後，預定出任應用化學科長之佐久間巖於1930年4月8日，從日本桐生高等工業學校暫調任臺北高商教授，是三科長中唯一現仍擔任教職者。擁有博士學位的佐久間，由於研究出類拔萃，名聞遐邇，據傳當時桐生高工還發起留任運動。同年4月14日任命總督府在外研究員，以9個月時間至德英美三國研究，5月3日自敦賀解纜，1931年1月3日歸朝

66 以上有關藤田之派任與動向，參見《府報》昭和年第850號，1929年12月25日，頁108；同昭和年第859號，1930年1月11日，頁24；昭和年第861號，1930年1月14日，頁30；昭和年第1152號，1931年1月17日，頁62。另外，〈公私人〉，《臺南新報》，1930年1月9日，2版；《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2。

67 〈藤田保太郎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3，文號8。

68 關於長濱之派任與動向，參見《府報》昭和年第886號，1930年2月12日，頁38；同昭和年第900號，1930年3月2日，頁3；昭和年第1152號，1931年1月17日，頁62。此外，〈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5月17日，2版；《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

69 〈長濱重麿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3，文號6。

上京。⁷⁰

佐久間1891年生，千葉縣人，九州帝國大學工科大学應用化學科畢業，曾擔任日本甘油（glycerine）工業株式會社技師，1921年起任教於桐生高等工業學校（今日本國立群馬大學），1929年6月提出研究論文而榮獲九州帝國大學工學博士。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聘任教授人事令與前2位科長無異，授課科目為有機化學。⁷¹

根據1931年1月7日勅令第2號頒布、同月15日起施行之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新設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職員定額編制為校長1人、教授4人、書記4人。⁷²依此，1月15日總督府公告若槻道隆校長，以及藤田、長濱、佐久間等3位教授之人事聘任。⁷³而書記方面，在此之前的1月12日文教局長提報內申辭令案，分別由金成茂生、吉田春彥、岩瀨通，以及黑住俊昭等4人，自1月15日起專職或兼任臺南高等

70 有關佐久間之派任與動向，參見《府報》昭和930號，1930年4月10日，頁32；同昭和935號，1930年4月16日，頁67；昭和1150號，1931年1月15日，頁58。〈辭令〉，《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4月9日，2版及1930年4月10日，2版；《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另外，關於日本桐生高工發起佐久間留任運動，參見大岩千太郎，〈雜錄：佐久間工學博士〉，臺灣糖業研究會《月刊糖業》，第19年第12號（1932年12月15日），頁30。

71 〈佐久間巖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3，文號7。

72 《府報》昭和1148號，1931年1月13日，頁51；《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事實上，上述9人3個月（1931年1月、2月、3月）之薪俸，總督府業於1930年度預算中編列。臺南高商在1929年3月被撤廢併入臺北高商後，隨著畢業生相繼離校，因自然減班之故，總督府乃於1930年5月呈報官制中改正，裁減臺北高商師資定額，該公文同時補充說明為配合1930年12月提報新設高工官制，因此於1930年度預算中已編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正式的人事費用，包括勅任俸給1人（校長）、奏任俸給4人（教授），以及判任俸給4人（書記），共計9人3個月之薪俸，參見〈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ス〉，《公文類聚》第五十四編・昭和五年・第八卷・官職七・官制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1200607500・類01705100）；〈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ス〉，《公文類聚》第五十五編・昭和六年・第九卷・官職七・官制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1200619500・類01735100）。

73 《府報》昭和1152號，1931年1月17日，頁62；《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辭令〉，《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6日，2版；〈高工校長及職員任命〉，《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6日，4版。

工業學校書記，⁷⁴進而於2月16日再增聘久保山保1員，⁷⁵成為含黑住俊昭1人兼職之共計5人的書記編制。至於教授缺額1人部分，則嗣後由伊形德一填補職缺。

如前所述，伊形於1930年歲暮在當時學務課長若槻道隆之薦舉下決定轉任本校，並於翌年初開始協助建校籌備事宜。伊形德一，1902年出生於熊本縣，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文學科畢業，在日本中學校短暫執教後，1927年赴臺至臺北一中任教。1931年2月若槻以新校長身份呈報伊形之教授人事案，擔任科目為英語科，3月3日正式發布任用令，至此教授4人編制已達足額。⁷⁶

之後，1931年3月31日勅令第31號公告、4月1日起實施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將掌管學生訓育事務之「生徒監」改名為「生徒主事」，並於高等工業學校增設助手一職，同時改訂本校教職員編制定額為校長1人、教授9人、助教授5人及助手3人。⁷⁷於是，邁入4月新年度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方面漸次充實師資陣容；⁷⁸另一方面若槻校長

74 〈金成茂生（任臺南高工書記兼府屬；俸給；勤務）〉；〈吉田春彥（任臺南高工書記；俸給）〉；〈岩瀨通（任臺南高工書記；俸給）〉；〈黑住俊昭（兼任臺南高工書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冊號10228，文號9。《府報》昭和年第1150號，1931年1月15日，頁58；《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該4人簡歷如下：金成茂生原任總督府屬兼臺南師範學校書記；吉田春彥文教局學務課雇員，歷任國語學校、臺北師範學校、農林專門學校、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以及臺南高等商業學校等單位書記；岩瀨通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書記，曾任職於專賣局和官房法務課；黑住俊昭任總督府屬兼。

75 〈久保山保（任臺南高工校書記；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冊號10228，文號34。《府報》昭和年第1176號，1931年2月17日，頁55；《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久保山保曾任職澎湖廳警務課、高雄州書記等。

76 〈伊形德一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3，文號62。《府報》昭和年第1189號，1931年3月5日，頁23；《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

77 〈御署名原本・昭和六年・勅令第三一號・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御署名原本》昭和六年・勅令第三一號（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21801000・御17748100）；《府報》昭和年第1211號，1931年4月2日，頁13；同昭和年第1220號，1931年4月15日，頁77；《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5。

78 譬如1931年4月17日任命譽田敏雄助教授，4月23日聘任林茂生、志賀孝平、竹上四郎、後藤魯一等教授，以因應官制改正規定之教師增員。其中如原任日本山梨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之竹上四郎，早於2月25日抵臺，28日先延聘為本校講師囑託，3月若槻校長提報教授人事案，4月正式成立。參見《府報》昭和年第1225號，1931年4月21日，頁108；《府報》昭和年第1229號，1931年4月25日，頁124；《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6。〈人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6日，2版；〈竹上四郎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4，文號20。

呈送伊形德一補任生徒主事之內申書，於4月1日正式發布任命令。⁷⁹除此之外，有關校內人事組織，依據3月30日本校制定之「處務規程」，4月1日也同時宣布三科長以及生徒課長兼教務課長伊形德一、事務課長兼會計係主任金成茂生的人事派令。⁸⁰

綜上所言，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初期的人事體制，概可歸納以下幾點說明。首先，在師資方面，由於本校係臺灣第一所高等工業教育機關，工業相關專業師資猶需仰賴日本國內，從今景彥物色延攬的科長資歷觀之，平均歲數約40的盛年，加上專業領域卓越優異的表現，且具豐富教學研究與業界實務經驗，無非皆是一時之選的菁英才俊，此項條件為日後學校發展奠定了堅實深厚的基礎。

其次，科長教授的聘任制度隱然可見當年臺北帝國大學之創校模式，亦即臺北帝大任命擬擔任講座教授者為「在外研究員」，並暫時以臺北高等學校或高等農林學校教授名義遴聘。⁸¹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亦依循仿效此先例，不僅派遣赴海外研修，同時也將人事任用暫編於學制上相同位階的臺北高商。因此，與其強調臺北高商在本校籌備時扮演人手支應角色，⁸²無寧說乃是當局籌校措施的慣例，畢竟商業、工業本屬截然不同的領域，商業學門專業教師並無法支應工業類學校。

復次，進一步分析早期師資結構，若端視學歷背景而論，仍以若槻、藤田與長濱等東京帝大出身者為主，此外，尚有伊形和竹上之京都帝大系統，以及佐久間的九州帝大系統。假如再參酌個人資歷經驗論之，則可發現有若槻、佐久間曾任教之桐生系統；或與今景彥共有外地經驗之長濱的滿洲系統；抑或如若槻、伊形在殖民地臺灣現職工作之在臺派與其他教員的日本內地派等。上述這些錯綜複雜而多元的學閥系譜

79 有關生徒主事聘任，為配合官制改正之頒布與實施，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等4所校長，均事先於3月下旬提報該人事案，參見〈伊形德一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生徒主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6年（193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64，文號2。《府報》昭和年第1212號，1931年4月3日，頁15；《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5。

80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5。另外，關於「處務規程」可詳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諸規程》，頁17-24；《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昭和七年度》，頁39-54。

81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頁46-47。

82 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頁236。

和人脈關係，事實上也反映在日後新進教師之晉用，以及引薦畢業生就職等方面。⁸³

再則，不容漠視伊形德一在1931年官制公布實施前後，對初奠學校基業所付出的貢獻。尤其在1月15日正式建校以前，因內定校長之若槻仍身兼學務課長正職，且三科長剛結束在外研修尚未來臺，囿於有限人力資源的情況下，面對迫在眉睫之開校籌備工作，其含辛茹苦之境，可想而知。縱使官制施行後，舉凡學校規程法案之制訂、教學設施與授課計畫之整備、策劃並辦理首屆招生入學考試，以及教職員聘任之折衝協調，甚至前述制服制帽領帶規制等大小瑣碎業務，皆參與其中，⁸⁴伊形可說是此時期校務行政工作實際上主要的推動者和執行者。就因為伊形熟稔校務，加上曾在臺北一中任教且帶領過棒球隊遠征甲子園，⁸⁵與學生接觸體驗頗豐，明瞭知悉臺灣教育現況，若槻校長拔擢其出任生徒主事，並兼職生徒課長和教務課長，平心而論，是可以理解的。

最後，就一般常被忽略、甚少討論之職員書記部分而言，專兼職合計5人當中，大致上皆具有擔任師範體系或高等專門教育機關書記之經驗，本職閱歷豐富，其中金成茂生和黑住俊昭2人曾任本校創設事務之屬。另外，與南臺灣有淵源者3人中，除久保山保外，金成和吉田春彥就有臺南在地工作之經歷，以上巧妙妥適的人事安排，亦是協助籌校業

83 有關新進教師聘任，例如：1941年8月佐久間繼若槻之後接掌第二任校長，佐久間於1942年6月經由母校九州帝大奧田讓教授的推薦，加藤清時轉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繼之，1943年7月時任應用化學科副科長之加藤（科長為佐久間校長兼），再透過奧田讓引荐同樣九州帝大畢業之千手諒一來校任教，以上參見千手諒一，〈C13の會會報發行に寄せて〉，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鳳木會會報：第33號》（橫濱：該會，1989年5月），頁11；千手諒一，〈思い出の記（1）：魚雷用の特殊燃料〉，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鳳木會會報：第36號》（橫濱：該會，1990年12月），頁17-18。另外，關於畢業生就職出路，譬如：當時不乏臺籍畢業生前往滿洲就業，其原因之一乃與長濱科長曾任教旅順工科大学有密切關係，詳見高淑媛，〈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和臺灣工業化〉，頁257；校史編纂小組編著，《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1年），頁229-230。又如：1936年3月應用化學科畢業之萩原浩三（原姓石川），經由佐久間科長介紹，至九州帝大時期友人擔任廠長之臺灣紙業株式會社二結工場就職，見萩原浩三，〈素晴らしかった私の歩いた道〉，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鳳木會會報特別號：六十周年記念》（橫濱：開校六十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91年），頁210-211。

84 伊形德一，《碌々四十年》，頁54-55；伊形德一，〈若槻校長の片鱗を覗く〉，頁68。另外，伊東貞昭，〈伊形先生の偲い出〉，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鳳木會會報：第29號》（橫濱：該會，1987年3月），頁5。

85 伊形德一，《碌々四十年》，頁40-49。

務順利推展的重要幕後功臣。總之，網羅日本國內工業專精的科長教授群，搭配文科出身之在臺教育家，並輔以行政資歷深厚的書記幕僚，構築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草創初期堅強的師資人事陣容。

二、設校任務和目標

為培育臺灣工業化和南進策略技術人才而設立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籌備團隊基於何者理念，設計規劃何種制度來勾勒新生學校的願景藍圖？1929年4月今景彥初臨臺灣之際，石黑文教局長公開表示，希望新設的高工能兼顧學理與實際，採兩相折衷調和而授予活用之學；石黑進一步指出，入學試驗設定以本島本位為考量，推斷報考者應以在臺日人子弟為多。另外，今景彥亦說明，新成立之高工擬以電氣應用化學為主體，認為所謂的高工乃介於大學和普通工業學校中間，肩負著指導普通工業之責且深具實務性質，故期待本校在電氣應用化學方面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色彩。⁸⁶基本上，兩人的談話揭示了學校初步的構想與特色，但另一方面卻也透露出維護在臺日人教育權益之意圖。

1930年初，今景彥在物色科長暫告段落後，再針對學校組織大綱提出個人意見，略謂：除三科長外，另設科學主事、產業主事、生徒主事、學藝主事及事務主事等五大主事，其中事務主事以書記任之，其他則委以教授充任。生徒主事各校皆俱設置，無所殊異，惟科學、產業、學藝三者將是臺灣高工獨樹一幟的特色。科學主事擔當物理、化學、數學等科目之教學；產業主事掌管和民間業者之間的聯絡；而學藝主事則與生徒主事維持密切關係，負責指導學生。⁸⁷

今氏的「五大主事組織」論，不僅架構出校務單位之基本雛形，同時也指引作為高等教育機關，尤其是實業專門學校極為重要的教育內容和目標。換言之，專業與基礎學科並重的教育訓練、與產業界緊密聯繫的產學合作，以及關注學生品德品行陶冶的訓育管理。該五大主事，除

86 〈臺南高工は六年度から開校，石黑文教局長談〉；〈特色ある高工に，今景彥氏〉，兩則報導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22日，2版；〈臺南高工六年度開校，以電氣應用化學為特色，石黑文教局長談〉，《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23日，夕刊4版。

87 〈臺南高工の創立事務進捗，三工學科長も近く決定，建築方面に特に留意〉；〈臺南高工創立事務進捗，三工學科長亦將決定，特留意建築方面〉。

生徒主事在前述1931年4月1日勅令第31號通令正式施行而告實現外，其餘四大主事雖然形式上職位名稱未見納編於日後之校務體系，然而實質上今氏之理想與精神已落實在1931年3月30日制定之學校「處務規程」。

根據該規程內文，生徒主事執掌學生訓育事務，而校內另分別設置以下單位主管：科長、學科主任、學級主任、工場長以及4課長（教務課、生徒課、圖書課、事務課，事務課下設庶務係和會計係，各係置主任）等。今氏所謂的科學主事即相當於學科主任，對照學校發行之《一覽》內單位編制，就是涵蓋外語、數學、物理等科目的共通學科，而產業主事一如掌理學生實習之工場長與教務課長，學藝主事和生徒主事則共同負責學生訓育指導，即類似生徒課長及學級主任，至於事務主事可視為4課長。⁸⁸

另外，實業專門教育機關所注重的教育訓練、產學合作、訓育管理等「三位一體」之教育方針，從校長和各科長創校初期的言談語錄，亦可感受體會本校對此理念的重視與堅持。官制實施後之1931年2月，若槻校長為建立明朗且新穎之學校，暢談其理想抱負，不僅講述制服制帽校徽之樣式，也特別強調將獎勵推廣體育運動，而學科則以實務為本位，避免空談理論，同時講求實習實驗，並與社會保持緊密聯繫，培育具有真正實力的工業人才。⁸⁹

學校成立後之同年6月，若槻又為文發表對新設學校以及在校師生之期待與勗勉，其要點概約如下：（一）學校非只是教育學生之所，應也是教師研究研發之地，教師的研究態度勢必成為學生的範本，因此教師除教育訓練學生之外，必須走出封閉的象牙塔，與實際社會接觸，並將研發成果普及社會，和產業界相互提攜，此為本校重要之特殊使命；（二）學生不僅修習專門知識，更要常懷報恩感念之心，放下身段，不恥下問，樂於勞務，遵奉規則命令，經營有秩序有規律的生活，成為擁有人格之技術家；（三）創造著實穩健的校風，體念國家設立本校之宗

88 有關「處務規程」參見前引資料，學校《一覽》可參照昭和七年度頁39 - 54、79 - 85。

89 〈朗かなスマートな學園にしたい，臺南高工創立事務所で若槻校長は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6日，8版。

旨，培養貢獻本島產業有用的人才。⁹⁰以上若槻之說明更具體詳述了三位一體的教育目標，也描繪出未來學校發展方向和理想形象。

因此，爾後若槻在評論臺灣工業發展時，再次闡述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重要意義及其扮演之角色。若槻指出本校機械、電氣、應化三科，乃參酌當時島內迫切急需之技術者以及在臺日人學生之志願而設，故學校教育考量本島的特殊性，以培植充滿抱負與活力的工業開拓先鋒。此外，若槻認為教職員不單只側重學生之教養，同時也應專心致力於各種工業基礎的學術研究，蓋一般工業學校性質可分兩類，其一為培育參與現存既有工業者；其二為造就能開創新興工業者，而本校究理坦言，宜隸屬於後者。⁹¹由上可知，一方面為振興臺灣工業而賦予學校崇高之使命；但另一方面也顯示本校學科設置係專為在臺日人子弟而量身打造，其維護殖民者教育權利之偏頗心態，可謂昭然若揭，歷歷在目。

相較於文科出身之若槻校長會顧及學生品德教育，三科長則各自從專業角度，申述學科之教育目標和展望。例如面對1934年3月首屆畢業生之期許，機械工學科長藤田保太郎表示，臺灣由農業漸次朝向工業轉型發展，本校的教學與研究主要是針對本島特有工業目的，以促進開發為其特色。⁹²而電氣工學科長長濱重麿指出，符合臺灣工業化之目標，培養直截慧識的年輕技術者乃為本校使命。⁹³另外，應用化學科長佐久間巖則強調學科之屬性和定位，一是配合臺灣本島特性，採取以製糖化學、油脂化學及製鹽化學為主、一般工業化學為從的教育主義方針；二是除人才培育外，主張研究成果應活用於工業建設，積極推動產學合作交流。⁹⁴上述三位科長之見解均立足紮根臺灣，力陳以適應本島實情特性之工業發展為主軸的設校任務與目標，其中佐久間更提示了教師職責

90 若槻道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臺灣時報》1931年6月號，頁5-7。此外，同樣見解亦可參閱〈工業報國の熱禱〉，載於《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頁1；〈開校祝賀式舉行せらる〉，收於同前《龍舌蘭》，頁11-12。

91 〈本島の工業發展と臺南高工の將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長若槻道隆〉；〈新工業を興す事が我校の使命〉，兩則報導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5月1日，15版。

92 藤田保太郎，〈工業臺灣への第一步〉，收於《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頁22-23。

93 長濱重麿，〈ミニットエンヂニヤ〉，收於《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頁23。

94 佐久間巖，〈祝賀式に當りて〉，收於《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頁24-26。

以及產學研發合作之重要性。

陸、正式創校與開學

如前所述，1931年1月7日勅令第1號公告、同月15日起實施之臺灣總督府部內臨時職員設置制中改正，廢止從事高工創設準備事務之專任屬2人配置，結束其階段性的編組任務；同時，復以勅令第2號頒行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新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並訂立教職員額編制。總督府據此，於1月15日以府令第1號公布學校規則，該規則開宗明義即規定：本校目的為「對欲從事工業之男子，施予必要的高等教育」。

另外，同日以告示第10號和第11號，分別明訂機關全銜、所在校址位置與創校日期，以及學校事務所暫置於總督府文教局內等事項，並發布校長、教授、書記之人事任命，而校方呈報之首屆招生事宜當日即刻核准，學校規程則於翌日16日獲得認可指令。⁹⁵

學校重要法規體系的完備建立，此後1月15日遂成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開校（建校）紀念日，甚至在1935年創校四週年校慶典禮之際，若槻校長訓示自今而後每月15日學校創立之日，除舉行升旗典禮外，全校師生不問在校內校外，當日上午8時應默禱、自省，以貫徹國旗觀念並強化精神修養，⁹⁶可見該日對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而言，深具特殊意涵。

依告示第11號，原暫設於文教局學務課一室之事務所，有鑑於空間太過狹窄，旋於1931年1月17日搬移至總督府三樓貴賓附屬室暫行視

95 以上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4；〈一月十五日から臺南高工設置，府報告示で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5日，7版；〈臺南高工規則十五日發表〉，《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6日，夕刊2版；〈臺南高工設置，十五日發表告示〉，《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6日，4版。關於府令第1號學校規則以及告示第10號、第11號，參見《府報》昭和1150號，1931年1月15日，頁55-58。另外，指令第103號認可之學校規程，參見《府報》昭和1152號，1931年1月16日，頁63-65。

96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26。

事，⁹⁷另一方面若槻校長也南巡視察新校舍，開始為南遷作業準備。⁹⁸2月27日事務所正式撤出總督府，全員陸續在3月7日以前轉移進駐臺南市本校，⁹⁹若槻校長則於3月5日攜家南下赴任，並隨即遍訪州知事，以及市內各官廳、學校和民間人士，¹⁰⁰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爰此落地生根，定歸臺南。

建校成立後，除學校本身校地校舍擴充外，聯外道路亦次第興工修築。依1930年度臺南市區改正計畫，當局原擬規劃自北門町臺南公園側邊道路，闢建一條連接至沿步兵第二聯隊牆垣之新路，而學校正門也預定設於此新道路的對面（今勝利路上）。¹⁰¹惟真正計畫實施略見變更，另闢新路改由壽町一丁目臺南二中道路，經陸軍用地至現今大學路上的正門。臺南州政府與陸軍洽商土地使用，並徵收若干民有地後進行施工，於1931年3月下旬竣工開通。¹⁰²

伴隨著學校設立和周邊環境日益繁榮，開始有人瞄準潛在商機，投資目光逐漸朝向昔日曾為荒郊之臺南東區。如翁河（貸屋業者）及川上八百藏（臺南市協議會員，曾任臺南新報主編）為首，預料三分子附近未來將形成臺南市另一鬧區，於是出面倡設建築組合，糾商投資開發當地。¹⁰³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創設，教育界欣表有助於臺灣文化向上提

97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若槻高工校長，三月中旬赴任〉，《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20日，夕刊1版；〈若槻校長三月赴任〉，《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20日，4版。

98 〈若槻高工校長，校舍其他視察〉，《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26日，5版；〈若槻高工校長視察校舍其他〉，《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26日，8版。

99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安山生，〈臺北通訊〉，《臺灣教育》，第344號（1931年3月），頁118。有關學校事務所南遷行動，媒體報導甚多，如下《臺灣日日新報》消息：〈若槻臺南高工校長送別會〉，1931年2月27日，夕刊2版；〈臺南高工創立の盛大な祝賀會，官民合同で開かん〉，1931年2月28日，夕刊2版；〈高工事務所臺南に移る〉，1931年2月28日，2版；〈臺南高工籌備就緒，四月新學期開校，官民合同盛開祝賀〉，1931年2月28日，4版。

100 〈若槻高工校長新任挨拶，七日歴訪して〉，《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9日，5版。

101 〈臺南高工の建築著手は十二月中旬から〉；〈臺南高工校建築期，豫定十二月中旬〉。

102 〈臺南高工への新設大道路，三月中に竣工の見込〉，《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7日，5版；〈臺南高工新設大道路，按三月中竣工〉，《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9日，4版；〈臺南高工の開校，來月八九日ごろ，祝賀會の準備進む〉，《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31日，夕刊1版。

103 〈臺南：創設組合〉，《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4月5日，4版。

升，¹⁰⁴輿論亦指出高工係現在最先進尖端之學校，而臺南的本校校舍建築打破以往本島舊有學校樣式，美輪美奐，相當新穎，早已吸引臺南在地中學生懷抱未來高工生之美夢；人氣鼎沸，甚至與號稱全臺第一入學窄門的醫專可相匹敵，斷言將可能成為島內升學的最大難關。¹⁰⁵但相反地，臺人有識者對於該校之新設，則頗感存疑和悲觀，認為不僅臺灣人將難免受其經費負擔之苦，且按過去既設大學、高校之事實鐵證，臺灣人恐怕是無福享受此等教育；尤其首任校長若槻道隆在擔任視學官時，對臺灣人的教育問題總抱持異樣見解，因此對於臺人子弟能否入學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不敢有所奢望與期待，¹⁰⁶顯見其意識的背後，隱含著殖民統治者剝削榨取臺人血汗而成就日人之不滿，況且廢除認知上以臺人為本位的臺南高商改立高工，心中殘留之怨懟依然記憶猶存。

關於首屆招生，募集訊息見諸《府報》及媒體，¹⁰⁷預定招收機械工學科、電氣工學科、應用化學科三科各30名，儘管當年度調漲學費，¹⁰⁸然報名者仍舊相當踴躍，競爭激烈。¹⁰⁹其中免試檢定部分，於2月24日先選拔14名合格者，再經3月16日的體檢與口試；而考試檢定方面，計有395人應考，3月16日至19日在本校及臺北高商南北兩地同時舉行入學考試，3月24日公告放榜，共錄取機械工學科25名、電氣工學科25

104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と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臺灣教育》，第344號（1931年3月），頁1。1931年同年，尚有一所「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成立，屬女子高等教育機關，惟法制上列為各種學校類之私立教育機構，詳見洪郁如，〈女子高等教育的殖民地的展開—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を中心に〉，收於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機會擴張と社會的相克》（京都：昭和堂，2008年），頁84-113。

105 〈朗かなスマートな學園にしたい，臺南高工創立事務所で若槻校長は語る〉。該記事前後段為記者文稿，中間段為若槻校長訪談內容。

106 〈臺南高工の新設〉，《臺灣新民報》，1931年1月17日，第347號，第2版。

107 《府報》昭和第十152號，1931年1月17日，頁65-66；〈臺南高工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7日，7版。

108 以往臺灣的專門學校和高等學校高等科之學費年額原為40圓，較日本國內各官立學校的80圓低廉，總督府考量與新設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取得均衡，乃修訂包括高等商業學校（府令第8號）、醫學專門學校（府令第9號）、高等學校（府令第10號）的學校規則，調高學費年額，4所學校均統一為60圓（高等學校尋常科由30圓調整為40圓），參見《府報》昭和第十180號，1931年2月21日，頁72；〈本島專門學校の授業料値上，年額四十圓を六十圓に〉，《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21日，7版。另外，有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學費規定，可見該校規則（府令第1號學校規則）第26條、27條內文。

109 參見以下《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南高工志願者二百五十名位か，入學試験は十六日から〉，1931年3月5日，夕刊2版；〈臺南高工志願者三倍，十六日起試験〉，1931年3月5日，夕刊4版；〈臺南高工の入試應募者，收容數の約四倍半〉，1931年3月14日，5版；〈臺南高工應募，有四倍半〉，1931年3月15日，夕刊4版。

名、應用化學科22名，合計72人（含免試檢定11人）。¹¹⁰4月10日新生辦理入學宣誓儀式，13日起正式上課，¹¹¹從此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以臺灣最高工業學府之姿，展開弦歌不輟、時雨春風的育才歲月。

該校的創建，對於臺南地方而言可說是一大盛事，當局還特別於1931年4月10日招待若槻校長及全體教職員，在臺南公會堂舉辦官民合同創校祝賀會，臺南市役所並受理有意參與民眾之申請，廣邀市民共襄盛舉。¹¹²當年還是10歲孩童，日後成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學生，戰後且是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的趙承琛就回憶說，本校的成立，不只臺南市，更是全臺灣的大事，當年目睹住家附近之大正公園（戰後改名民生綠園，今為湯德章紀念公園）舉行創校成立慶祝盛會，留下深刻的印象。¹¹³

柒、結論

綜觀以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籌辦建校歷史，可整理歸納如下結論。首先，當局在籌畫組織的用人安排及業務推動方面，審時度勢，頗為深謀遠慮。1929年的前階段，延攬富有多所籌校經驗之今景彥擔綱，借重其長才奠立根基，一則與日本國內工業碩儒戮力共商，物色遴選學有專精的科長教授；二則協助擇定適宜且可供日後發展的廣大校地，俾利

110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5；〈臺南高工無試驗志願者選拔〉，《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25日，7版；〈臺南高工四月初開校〉，《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22日，4版。此外，首屆榜單參見《府報》昭和第1221號，1931年4月16日，頁84。當年72名錄取新生中，不尋常地出現臺人日人各占一半之特殊結果，似乎有違總督府日人多數的招生政策，其確實原因未明，參閱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頁36-43。

111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5-6。

11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如下報導：前引〈臺南高工創立的盛大な祝賀會，官民合同で開かん〉；〈臺南高工籌備就緒，四月新學期開校，官民合同盛開祝賀〉；〈臺南高工の開校，來月八九日ごろ，祝賀會の準備進む〉。另外，〈臺南市民合同の高工開校祝賀會，八日公會堂に開催に決す〉，1931年4月7日，5版；〈高工開校市民祝賀會，八日在公會堂〉，1931年4月8日，夕刊4版；〈臺南高工開校祝賀會，若槻校長、職員二十名を招待，臺南市民合同で〉，1931年4月12日，夕刊2版；〈臺南高工開校祝賀，官民合同主開〉，1931年4月12日，夕刊4版。

113 趙承琛，〈成功大學六十年的回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1994年），頁98。

臺南州政府進行土地徵收和寄贈國庫手續，同時也開啟臺南市貌榮景向東拓展之契機。而後階段的1930年，擴編籌備組織以若槻道隆為首、熟習殖民地臺灣之行政官僚團隊，籌辦工作延伸涵蓋至全面性且具體之開校事務，不僅在州府雙方齊心合作下，整地、追加擴充校地以及校舍建築等硬體建設相繼竣工完成；法規制度與人事體制之軟體建置，亦日漸齊備成形。

其次，在籌備期間的前階段，適逢日本國內政黨輪替執政，連帶牽動影響高工籌校計畫一度出現變數。政策的不連續性，除定調緊縮內閣之大環境因素外，主要本源於中央政府與臺灣總督府對此新校設置，認定係屬新規事業或既定之繼續事業的差異。然而，如此混亂之教育政策，事實上遠可追溯自新臺灣教育令實施以降，受制於日本國內政黨政治導致總督更迭頻仍，臺灣實業專門學校制度游移在商專、高商、高工相繼興廢之歷程，其脈絡演變同出一轍。政黨內閣介入殖民地人事，進而將殖民地統治「私物化」的特殊現象，¹¹⁴以教育層面論之，從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校決策以及籌備過程預算中控的實例，亦可洞若觀火。另外，面對朝令夕改之政策轉換，臺南在地民情持續糾葛著複雜的族群意識，呈現或迎或拒、時冷時熱而愛恨交織的市民對應態度。

最後，有關教職員聘任方面，網羅來自日本國內教學研究和業界實務經驗豐富之專業科長教授群，並結合熟稔臺灣教育現況之校長、教師以及書記的駐臺教育家與行政幕僚，構築了學校草創初期堅強的師資人事陣容。也因他們的理想和努力，將獨創之「五大主事組織」論的精神具體落實於校務制度，同時也導引出兼顧教育訓練、產學合作、訓育管理的「三位一體」教育方針，加上以學理實際並重、符合臺灣本島實情特性為重點特色之建校宗旨，從而形塑了該校重要的教育目標，為往後的學校發展奠定其永續經營之基業。

114 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と帝國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年），頁376 - 377。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公文類聚》（東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 《御署名原本》（東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臺灣總督府府報》，1929年－1931年。
- 《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933年。
- 《臺南新報》，1930年1月8日，夕刊1版；1930年1月9日，夕刊4版；1930年1月9日，2版。
- 《臺灣民報》，1929年8月4日，第272號，4版；1929年8月11日，第273號，2版。
- 《臺灣新民報》，1931年1月17日，第347號，第2版。
-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藏）。
-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諸規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藏）。
-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昭和七年度。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32年10月。
-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昭和十五年度。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1940年7月。
- 《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1934年7月。

二、專書

-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 校史編纂小組編著，《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1年。
-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年。
- 伊形德一，《碌々四十年》。東京：東宣出版，1979年。

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と帝國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年。

黃昭堂，《臺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8年。

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收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輯，《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2年。

高淑媛，〈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和臺灣工業化〉，收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輯，《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2年。

趙承琛，〈成功大學六十年的回憶〉，收入《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1994年。

小倉勇，〈佐久間先生を介して開校當時を偲ぶ〉，收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東京：開校5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81年。

伊形徳一，〈若槻校長の片鱗を覗く〉，收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東京：開校5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81年。

伊東貞昭，〈亡き師の面影を偲んで〉，收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東京：開校5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81年。

萩原浩三，〈素晴らしかった私の歩いた道〉，收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鳳木會會報特別號：六十周年記念》。横浜：開校六十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91年。

洪郁如，〈女子高等教育の植民地的展開－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を中心に〉，收入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機會擴張と社會的相克》。京都：昭和堂，2008年。

三、期刊

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2期，2009年6月。

- 王耀德，〈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立之研究〉，《臺灣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6月。
- 大岩千太郎，〈雜錄：佐久間工學博士〉，臺灣糖業研究會《月刊糖業》第19年第12號，1932年12月15日。
- 千手諒一，〈C13の會會報發行に寄せて〉，《鳳木會會報》第33號。橫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1989年5月。
- 千手諒一，〈思い出の記（1）：魚雷用の特殊燃料〉，《鳳木會會報》第36號。橫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1990年12月。
- 王榮，〈日本統治時代の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に關する一考察〉，《現代臺灣研究》第23號，2002年7月。
- 安山生，〈臺北通訊〉，《臺灣教育》第344號，1931年3月。
- 伊形徳一，〈75歳の弁〉，《鳳木會會報》第7號。東京：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1977年6月。
- 伊形徳一，〈追懷〉，《鳳木會會報》第23號。橫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1984年5月。
- 伊東貞昭，〈伊形先生の思い出〉，《鳳木會會報》第29號。橫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1987年3月。
- 佐久間巖，〈祝賀式に當りて〉，《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1934年7月。
- 若槻道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臺灣時報》1931年6月號。
- 若槻道隆，〈工業報國の熱禱〉，《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1934年7月。
- 若槻道隆，〈開校祝賀式舉行せらる〉，《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1934年7月。
- 長濱重麿，〈ミニットエンジニア〉，《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1934年7月。
- 藤田保太郎，〈工業臺灣への第一歩〉，《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1934年7月。

編者，〈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と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臺灣教育》第344號，1931年3月。

四、學位論文

陳順清，〈1927 - 1956之臺灣工業教育：以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與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The Organizing and Founding Process of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Yao-te Wang*

Abstract

Besides the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Taipei High School, the medical, agriculture & forestry, business, and engineering school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ere also formed by the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order to cultivate a variety of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The specialized colleges were built gradually in response to the trends of the coloni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respectively. Among these specialized colleges,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was the last one to found by the Government House and it inevitably accumulated some certain degree of experience in the stage of college building. The earlier college system established in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influenced the overall college's future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This study focuses and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s preparatory and founding work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lity and model of professional school establishmen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faculty policy was planned and arranged properly by the authority during the two year college's preparatory stage. Firstly, recruiting Kon Kagehiko who was experienced in running school business to consolidate the program foundation, then expanding the preparatory organizational scale and finally the Taiwan staff led by Wakatsuki Michitaka took over the program to continuously and progressively promote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technical specialist and college professors selected from Japan and Taiwanese local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籌辦與建校

*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educators and secretary aides who were familiar with the existing Taiwan situation were also recruite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faculty. Meantime, they carried out their ideal vision and ambition through the school system to establish important education goals. In addition, the plan was once almost on the verge of abortion during the preparatory stage and it mainly was affected by the Japan's domestic political movement. The privatization policy of colonial rule conducted by the political party cabinet resulted in the rupture and chaos of education policy. By means of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s study,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college preparatory and founding work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Key words :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Preparatory Work in College Foundation, Kon Kagehiko, Wakatsuki Michitaka, Education Goals